

“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解的一个视角

刘永安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日常的理解中,存在着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性的倾向,其实,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的背后存在着伦理的动因,其理论的实践指向也以道德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的依归。马克思主义不仅从事实的层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且还具有明确清醒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但与道德说教和乌托邦空想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将道德的理想、价值的诉求建立在科学认知的理性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性只有与存在论意义上的道义性相结合才不至于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统一的角度得到整体性的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事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4)02-0014-06

历史必然性的事实判断与道德应然性的价值判断问题,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性与存在论意义上的道义性问题,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事实与价值论题所关涉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解读和看法存在种种分歧与论争。事实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是对立、分离抑或是融合与统一?这一问题的回答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获得整体性的理解密切相关,倘若必然性与应然性、科学性与道义性、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追求在马克思主义当中不能获得统一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会被碎片化,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部分就不能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因此,当我们业已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足够领会的同时,如果还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那我们就可以从事实与价值统一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形成整体性的理解。

一、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与分离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事实与价值的争论中,事实与价值就表露出对立与分离的倾向与端倪。伯恩斯坦和福伦德深受新康

德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新康德主义者主张的“伦理社会主义”亦步亦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客观的、规范中立的社会科学或简单的政治实践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一种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础之上。”^{[1]29}但他们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的维度而没有道德的维度,这致使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去寻找这种道德力量和价值诉求,而是将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最终使得他们流于马克思主义竭力批判的道德说教,进而通过修正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本有的科学性。以上做法遭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的强烈反对,考茨基拒绝将社会主义建立在道德哲学或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但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他却放弃了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传统,未能辩证地看待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的关系,而是接受了康德式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他非常赞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的以下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研究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发

收稿日期:2014-0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10043)

作者简介:刘永安(1977—),男,山西五台人,讲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研究。

现因果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是没有价值判断的。”^{[2]27}显然像考茨基和希法亭这些理论家们,他们“身处于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达尔文主义风靡世界的特定历史时期,再加上他们理论修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世界观性质和革命批判本质有所忽略”^[3],这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带有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倾向,他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同时,无形中将马克思主义“去哲学化”,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意识、道德批判历史作用的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解释成一种价值无涉的和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这无疑在强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同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将科学事实与价值判断割裂和对立起来。20世纪中后期,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结构主义的诠释,这种解读同样具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的倾向。阿尔都塞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更看重一些结构性的社会因素和概念在社会历史理论当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4]这种解释倾向自觉不自觉地过分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意义,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为根本或处于优先地位的存在论意义,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和道义诉求受到抑制,从而使道德因素和主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当中长期隐而不显。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来弥合事实与价值对立所致的裂痕。第二国际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和阿德勒就以当时那场论争的斡旋者自居,但他们的调停并不成功。他们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拒绝任何为社会主义寻找道德根据的企图,但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同时,并不像考茨基那样对道德信念和价值判断予以排斥,他们对于激励社会主义者为之奋斗的道德信念,并没有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反道德主义者的嘲讽姿态,但他们并没有实质性解决马克思主义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事实与价值在他们那里虽不对立,但也是自说自话彼此分离。20世纪中叶,卡尔·波普尔也试图对此问题提出一种折中的解释,他试图在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历史主义”和体现其道德性的“行动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二者的桥梁,为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解释为“历史主义的道德论”。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事实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将历史的必然性接受为道德的正当性。在他揣摩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他认为马克思的可能

性回答是:“我就把即将来临的时期这一事实作为我的道德标准来采纳了。”^{[5]317}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形态连同它的道德在历史主义所揭示的社会规律面前必然会出现,那么持有这种必然也会出现的道德就是应该的。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决定赞成无产阶级及其道德的原因在于,“这个决定只是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建立在科学的历史预言之上。”这种决定“不是一种帮助被压迫者的情感上的决定,而是不向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徒劳的抵抗的科学的和合理的决定。只是在我作了这种决定之后,我才准备采纳并充分利用那些道德情感。”^{[5]317}可见,波普尔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判断时,把价值判断从属于或等同于事实判断,这本质上还是把马克思主义误读为以科学性排斥独立进行道德判断的可能性。虽然波普尔自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的解释可以解决事实和应该之间的悖论和鸿沟,但其解释也同样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进而未能准确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

早在20世纪之初,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解释路线的咄咄攻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等就敏锐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整体性的丧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主体性的拯救,以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得到太多的强调和普及的现状,我们需要的是沿着先驱的足迹,从“事实”与“应该”的对立与分离之处出发,踏着实践的基石,去寻找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道义与价值,以使马克思主义能在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上获得整体性的理解。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和道义诉求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一生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止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他们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造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期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道义的诉求必然使他们的科学研究拥有着明确和强烈的实践指向,以批判现有和实现应有为最终的依归。诚然马克思剖析和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曾发生过从人本主义伦理学方法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者和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关节点,这里涉及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老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是否决裂以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何者优先等问题,但不管涉及多少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马

克思主义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强调没有变,如果说这种变化会引发某种断裂的话,也只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断裂,而不是价值论的断裂。“马克思不论在哲学方法上发生了怎样的变革,道德因素都并没有被抛弃,也不可能被抛弃。如果将道德从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中清洗出去,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道义基础。”^[6] 马克思不会因为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就放弃追求美好社会、谋求人类解放的道德初衷,恰恰相反的倒是,通过这种转变马克思为这种理想的实现找到了一条避免空想乌托邦的科学的道路,使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追求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理论的科学化并未使理论脱离现实实践,也并未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忘却了道义的追求。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地说过“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⁷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直抒胸臆的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7]³⁰⁷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表达的道义追求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为什么我们还对他们的道德动机抱有不确信的态度,并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问题时那么腴腆、那么谨小慎微呢?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其研究的终极目的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他们全部科学创作的背后隐藏着他们极其崇高的伦理的和人道主义的动机,他们的理论研究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旨在为了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寻求一条理性的道路,对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才是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终极关怀,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批判性相结合的理论本性。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流变当中遭到了割裂和曲解,其中一种形成了较大负面影响的曲解是如同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解释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脱离了实践的以科学认知为目的的理论观察,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丧失了批判维度的描述性的实证性理论。对此,柯尔施就批评说:“理论和实践不可

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2]²⁵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独立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以变革和改造现存世界为目的的饱含实践精神的革命理论或批判理论。无疑柯尔施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其努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是一种及时的纠正。如果脱离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会被片面地在知识论的范畴内,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如果任由这种曲解泛滥,就会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传统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无法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意义。事实上从上面的文本分析来看,实践的需要和道义的诉求才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去认识世界、解开历史之谜的内在的动因,解决和改变人现实的存在问题以期实现应有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也就是生存论的本体论。”^[8] 我们这里丝毫不贬低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认识论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只有与强调实践和道德理想的存在论意义相结合才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一点里查德·诺曼极具洞见,他说:“我坚持认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以价值为中心。”“只有和具体特定的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才是可以理解的。”^[9]⁵¹⁻⁵² 因此,实践指向和道义诉求绝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可有可无的部分,没有了它们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0]⁷⁷⁷ 这样的评价再次提醒我们,不仅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上的科学性,更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承载和背负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道义和价值。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冷冰冰的与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很难想象剥离了道义,马克思主义会有如此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应然性判断

既然马克思主义承载着一定的道义诉求,那么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应该有自己的善恶观念和价值判断。但对于那些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的人来说,问题似乎没这么简单。我们

可以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和道德的评价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忽视了道德应然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无自己的道德应然性判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必然性事实,还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和道德的评价。相对于以往的各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物质丰富等方面的历史进步意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只关注历史必然性或历史意义问题而对道德应然性问题不闻不问,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评价,还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的拷问,但在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评价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是复杂的和辩证的。相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人身的奴役和依附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反人道和非人性相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与等级、专制和非人道相对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观念无疑是道德历史进步的表现,也正有此一些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7]274}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激烈地饱含道德义愤地对资本主义予以了道德的谴责和批判,这不仅表现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血腥”与“肮脏”,在其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11],而且还表现在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的另一种历史形式,其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在道德上具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7]274-27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历史必然性和道德合理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暂时性背离现象具有极其清醒地认识,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一次演讲中就不无忧虑地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7]775}由此可知,尽管道德的恶果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相伴随的一种历史的事实,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因此就否认这些道德后果恶的性质。面对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进步意义与其所带来的道德恶果的窘境,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既不诉诸抽象的道德

理论将价值的判断游离于历史的视域之外,苛求于历史发展的道德清白,通过一味地的道德批判抹杀或消解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它对于推动历史的文明和进步的意义,也没有偏执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历史评价而罔顾或漠视资本主义的道德恶果,视道德批判为“意识形态的胡话”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

由上文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必然性问题时并没有忽视道德应然性的问题,而且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以上见解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以历史必然性代替道德应然性的论证,进而认为必然性的或发展出的“事实”就都在道德上是“应该”的,而这一点在事实上却经常遭到误读和曲解,这种曲解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说成是道德历史主义。道德历史主义认为无论已发展出或将要发展出怎样的社会结构或道德观念,其本身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这种曲解显然在学理上是无法成立的,一些道德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绝不能因为它们只能如此这般的存在就认为它们具有道德的合法性。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社会学说明了一定时期主导的或占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是决定于或受制于这个时期的生产方式,即这种道德观念是对那个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种功能性的适应,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具有被决定性的特征与它们的合法有效性是有区别的。”^{[1]151}这就是说必然性的事实判断不能代替道德的价值判断,必然性不是为事实进行道德辩护的理由。尽管按照“应当蕴含能够”的道德原则,我们不能够对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进行义务的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进行道德价值的判断。因此,无论从文本还是学理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绝没有将事实判断等同于或代替价值判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道德价值立场,这种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专门加以说明,但它是能够得到相应的伦理解释的。凯·尼尔森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立场可以通过情境客观主义的解释模式得到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道德自明之理为价值参照,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的道德情境,来对道德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做出说明和判断的。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在既定的客观条件和情境中,那种可行并更能充分实现道德自明之理的道德原则更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可根据不同道德类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道德自明之理的实现限度来甄别它们的优越性。”^[12]尼尔森的这种学理解释,既保证了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判断的客观性,避免了道德相对主义,抛弃了道

德怀疑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也不与马克思主义对道德多样性的事实判断和对资本主义道德谴责的事实相抵触,使马克思主义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得到逻辑一致的解释。而反观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解释为道德历史主义的种种主张就具有诸多不合理性。首先,如果道德历史主义认为无论已发展出或是将要发展出怎样的社会结构,其本身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那么从道德的角度对现存进行道德批判就是不可能的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强烈道德谴责是相抵触的。其次,如果事实的必然性可以作为道德应然性的辩护的话,那么历史必然发展出的事实就都是合理的,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与不同社会结构或形态相对应的道德的可比性,换言之,它在道德上持有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而否定了道德的进步性,这与恩格斯明确承认的道德进步的观念是不符合的。最后,道德历史主义对历史发展出的社会结构的道德正当性的肯定,事实上肯定了历史合理性、道德合理性的无条件统一,这无疑排除了道德发展中出现退步、堕落甚至恶的可能性。而事实却是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历史与道德的背离现象,道德的进步绝不是线性发展而不存在曲折性的,在历史的发展中道德还存在暂时性的退步。总之,马克思主义应然性的道德价值判断不仅不与伦理学理存在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得到伦理学理的解释而不至于使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自相矛盾。因此,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从学理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在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动因和规律时,既没有忽视道德应然性的问题,更没有以历史的必然性代替或抹杀道德应然性的判断,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道德价值判断。

四、马克思主义对道德价值实现条件的看法

上文谈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的判断问题,但道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判断或口头的说辞,而是一个需要付诸实践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对道德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条件是怎样的看法呢?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不再采用人本主义的伦理学方法来探讨未来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实现问题。经过这一方法论或认识论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力图把它的价值观和批判建立在它的社会理论上,从而把它们奠定在正确的——客观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和道德的基础之上。”^{[9]392}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道德理想应该建立在社会科学认知的理性基础之上,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是道德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

就忽略或抹杀主体实践和阶级意识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因此,道德价值的实现既依赖于社会的变革也与主体的意识觉悟、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息息相关。

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做出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道德被看作是依附于一定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因此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谈论道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305}。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抽象地谈论道德的应然性原则,他们在谈论道德原则时一定会相应地提到这种道德原则赖以确立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强调道德理想实现的现实主义道路,他们把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诉求的实现寄希望于社会的改造与变革的进程之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绝不是个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对抗,要想消除这种对抗,消除这种对抗在道德上所表现出来的不人道、不正义,首先应该消除产生这种对抗的社会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7]194}可见基于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将与特定生产方式相伴随的道德恶的扬弃建立在生产方式变革的理性基础之上。马克思除了强调道德价值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之外,历史主体尤其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价值选择、道德批判及其实践也是道德价值实现必要的主观条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解放时就说:“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16}这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了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13]可见,在道德价值实现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绝没有认为历史主体的意识觉悟、价值选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条件的变革固然为道德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但这种变革必须经由阶级觉悟,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而阶级意识也绝不是经济社会变革自发的或相伴随的产物,无产阶

级并不天然地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并不天然地就对自身的道德处境、历史使命以及变革社会的道路等具有清醒地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遗余力地对鲍威尔、普鲁东、杜林和拉萨尔等的理论主张展开批判的目的就在于扫除迷惑工人阶级的一些思想障碍,致力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由此说来,马克思并没有把道德价值的实现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道德特征并不是仅由生产力发展就能就能够解释的。关于这一点,就连对“生产力的首要性”做过辩护和论证的柯亨也承认生产力解释的限度,他说:“当我们多少有点含糊地说生产力解释生产关系的特征时,我们意指的是它们解释生产力关系的某些特征,而当然不是全部特征。”^[14]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德布拉·萨茨就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机制,即价值的解释机制。德布拉·萨茨在肯定和承认柯亨所提出的生产力发展的因果机制之外,还附加了一个导致社会自由不断发展的意向性机制,并认为这样一个诉诸价值的意向性机制主要是通过阶级,特别是通过非主导阶级认识到他们在自由方面的利益而发挥作用。萨茨的这一补充对于我们解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道德价值实现的想法大有裨益,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条件的变革无疑是道德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但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意识同样在社会改造和人得解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说明道德价值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道德价值的实现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强调通过改造社会以实现人的解放的缘由之所在,但社会的改造与变革既是一个遵循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活动主体的意志和价值取舍参与其中的一个过程。因此,在道德价值实现的具体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因果机制和历史主体的意向性机制同样发挥着作用,只有将它们相结合才能解释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些道德现象和特征,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对道德价值实现的路径和条件的真实看法。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绝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道义和价值,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地阐释为是与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这种做法割裂了事实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本来的统一性,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本有的整体性。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剥离了存在论意义上的道德动机和道义追求,单一科学性维度下

的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她本有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这将有碍于我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解释力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批判中的解放作用。事实上,事实与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必然性的事实,同时还对这种必然性的事实予以了道德应然性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方法的科学性,其最终用意是旨在使其终极性的道义关怀和价值追求能够通过科学理性的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必然性与应然性、科学性与道义性、真理性认识与价值性追求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或彼此分离的,我们完全可以从事实与价值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获得一种理解。

参考文献:

- [1] NIELSEN K. Marxism and the moral point of view: morality, ide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9.
- [2] 卡尔·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 王南湜, 荣新海,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3] 吴远, 李秀娟.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整体性的逻辑推进[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5(1): 1-6.
- [4]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23.
- [5] 卡尔·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2卷[M]. 陆衡,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6] 姜迎春. 断裂与延续: 论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道德因素及其价值[J]. 江海学刊, 2007(4): 35-40.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0.
- [9] 罗伯特·韦尔, 凯·尼尔森.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新论[M]. 鲁克俭,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60.
- [12] 刘永安. 凯·尼尔森对唯物史观道德立场的澄清与阐释[J]. 理论探索, 2012(5): 27-30.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55.
- [14] 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3.